

舞
姬

煤早就装上了船。在这间中等船舱里，只有电灯空自亮得耀眼，桌子四周一片寂寥。夜夜在此摸骨牌的人，今晚都住到旅馆里去了，船上只留下了我一人。

那是五年前的事了。我夙愿得偿，奉命出国，曾经路过这西贡码头。那时节，耳闻目睹的，无不使我感到新奇。每日信笔写下的游记文字，不下数千言，登在报上，颇得时人赞赏。如今回想起来，通篇都是幼稚的想法和狂妄的言语。不然，便把些寻常的草木金石、飞禽走兽，以至风俗人情，当作什么稀罕事儿，一一记了下来，足以贻笑大方。这次为了写日记，启程前也曾买了一个本子，可是，至今未着一字，仍是一个空本子。难道我在德国留学一番，竟变得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了吗？不，这其中另有缘故。

今日东返归国的我，确非当年西渡留学的我了。学业上固然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，但我却饱尝了世道艰辛，懂得了人心叵

测，甚至连自己这颗心也变得反复无常，难以捉摸。即便把自己这种“昨是而今非”的刹那间感触写下来，又能拿给谁看呢！难道这就是我写不出日记的缘故吗？不，这其中另有缘故。

哦！轮船从意大利布林迪西港起航以来，已经有二十多天了。按理说，途中萍水相逢的旅客，相互可以慰藉旅途的寂寞，可是，我却借口略有不适，蛰居在客舱里，甚至和同行的旅伴都很少讲话，整日里为一桩旁人不知的恨事而苦恼。这件恨事，最初像一抹乌云掠过我的心头，使我既无心欣赏瑞士的山色，也不去留意意大利的古迹。嗣后竟至悲观厌世起来，感到人生无常。内心的惨痛令我终日回肠九转，现在已变成一片云翳，深深郁结在我的心头，不论是看书还是做事，这惨痛宛如影之随形，响之应声，勾起我无限的旧情，无时不在啃啮我这颗心。啊！此恨绵绵，究竟怎样才能消融？倘若是别种恨事，还可托之诗歌遣散胸中的郁闷。但是，唯有这件恨事却是刻骨铭心，怎么也排遣不了。今晚四下无人，还要过很久才有侍者来熄灯，趁此时权且将这段恨事记叙下来吧。

我自幼受到严格的家教。虽然早年丧父，学业上却未曾荒疏。无论是在旧藩^①的学馆，或是到东京上预科，即便进了法律系之后，我太田丰太郎的大名始终是名列前茅的。与我这个独子相依为命的寡母，大概感到很安慰了。十九岁上，我获得学士学位，人人都说，这是大学开办以来从未颁过的荣誉。后来，在某部任职，把

① 明治维新后，称江户时代（1600—1867）诸侯的领地为旧藩。

母亲从乡下接到东京，度过了三年的快乐时光。上司很器重我，派我出国考察业务。我心想，这正是扬名显姓、兴家立业的良机，于是劲头十足，即使抛别年过半百的母亲，也不觉有多大的离情别绪。就这样迢迢万里，背井离乡，来到了德国首都柏林。

我怀着模糊的功名心和勤勉的苦学精神，忽然置身于欧洲这座新兴的大都会——光怪陆离，令我眼花缭乱；五色缤纷，使我神摇意夺。这条“大道直如发”的Unter den Linden^①，假如把街名译做“菩提树下”的话，会使人以为是个幽静的去处，但是，你一旦走到这里，就可以看到两旁石铺人行道上的仕女如云。那时候，威廉一世还时常会凭窗眺望街景；挺胸耸肩的军官穿着礼服；佩着彩饰；艳丽的少女照着巴黎的款式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一切的一切，无不令人瞠目结舌。形形色色的马车，在柏油路上往来如飞，高耸云霄的楼宇之间的空地上，喷水池溅起的水声宛如晴空里骤雨的淅沥。向远处望去，隔着勃兰登堡门，在绿树掩映下，可以望见凯旋塔上浮在半空的女神像。这许许多多景物，一时间纷至沓来，映入眼帘，使一个新来乍到的人感到应接不暇。但是，我在心里曾暗暗发誓：“纵然身处怎样的花花世界，我的心绝不为它所动。”我常拿这一誓言来抵御外界的诱惑。

我拉响门铃，通名求见。出示公函说明来意之后，德国的官员很高兴地接待我，并且谈妥，只要公使馆方面手续办好，不论什么

① Unter den Linden：柏林菩提树大街，长1475米，宽60米，是欧洲著名的林荫大道。

事都可随时关照我。所幸我在国内学过德文和法文，他们初次见到我，没人不问我是在何时何地学的德文。

得到上级准许，公事之余，可以入当地大学进修政治学，我便办了注册手续。

过了一两个月，公事接洽完毕，考察工作也进展顺利，我把一应急件先写成报告寄回国内，非急件写好后也整理成几大卷待发。可是大学不像我想的那样幼稚，根本没有专为培养政治家而开设的课程。我踌躇再三，终于选定了两三位法学家的课。交过学费，便去听课了。

这样，三年的时光梦也似的过去了。人的秉性终难压抑，一旦时机成熟，总要露出头来。我一向恪守父亲的遗训，听从母亲的教诲。小时人家夸我是神童，也从不沾沾自喜，依旧好学不倦。即便后来涉足官场，上司称赞我能干，我便更加谨慎从事，从未意识到自己竟成为一个拨一拨动一动的机器人了。如今，在二十五岁上，经过大学里这种自由风气的渐渐熏陶，心中总难平静，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真我，终于露出头来，好似在反抗往日那个虚伪的旧我。我恍然大悟，自己既不适于当叱咤风云的政治家，也不宜于做通晓法典、善于断狱的大法官。

我寻思道：母亲希望我当个活字典，上司则想把我造就成一个活法典。当活字典，还可勉为其难，做活法典，却是无法忍受的。从前，不论多么琐碎的问题，我都郑重其事地加以答复；近来，在寄给上司的函件里，竟高谈阔论什么不可拘泥于法制的细节，一旦

领会法律的精神实质，虽万事纷纭仍可迎刃而解云云。在大学里，我早把法律课程置诸脑后，兴趣转到文史方面，并渐入佳境。

但是，上司是要把我造成供他颐指气使的工具，怎会喜欢一个具有独立思想、翘然不群的人呢？！所以，我当时处境便有些不稳。不过，光凭这一点还不至于动摇我的地位。在柏林的留学生中，有一群颇有势力的人物，我同他们关系素来欠佳。他们对我猜疑，竟至谗言诽谤，然而，这也并非事出无因。

我既不和他们一起喝啤酒，又不跟他们打台球。他们便说我顽固不化，道貌岸然。并且还嘲笑我，嫉妒我。其实，这一切都源于他们不了解我。唉，连我自己尚且不了解自己，别人又怎能了解呢？！我的心宛如一颗处女的心，又似合欢树上的叶儿，一碰到什么便要退缩躲闪。我自幼便遵从长者的教诲，不论求学还是供职，都非出于自己的本意。即便表面看来好像是靠毅力和苦学，其实那也是自欺欺人，我不过是跟着前人亦步亦趋而已。我之所以能清心寡欲，不受外界诱惑，并非因为有律己的勇气，只因我对外界感到恐惧，自己约束自己罢了。在出国离乡之前，我丝毫不怀疑自己是有为之士，也深信自己志气刚毅。唉唉，那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！轮船离开横滨时，一向自命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竟然泪如泉涌，浸湿了一方手帕，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然而，这倒正是我的本性。这种本性是生来如此的，还是因为早年丧父，在母亲一手培育下所造成的呢？

他们固然可以嘲弄我，至于嫉妒，嫉妒这样一颗脆弱而可怜的

心，却是何其愚蠢！

看见浓妆艳抹的女人坐在咖啡馆门口招揽客人，我不敢过去和她们亲近。遇到头戴高礼帽、鼻架夹鼻眼镜、一口普鲁士贵族口音的“花花公子”，就更不敢同他们交往了。既然缺乏这种勇气，当然也就无法同我那些活跃的同胞往来。由于彼此疏远，他们对我不仅嘲笑、嫉妒，而且还夹杂着猜忌的成分。这正是使我蒙冤受屈，在短暂的时日里饱尝人间无限辛酸的因由。

一天傍晚，我在动物园散步，回珍宝街的寓所，走过菩提树下大街，来到修道院街的旧教堂前。每当我从灯火辉煌的大街走进这狭窄昏暗的小巷，便望见这座凹形的旧教堂。教堂对面是栋出租的公寓房子。楼上一户人家在栏杆上晾着床单、衬衣之类，还没有收进去；楼下是家小酒店，门口站着一个留长胡子的犹太教徒；楼房共有两座楼梯，一座直通楼上，另一座则通往地下室的铁匠家里。每当我仰望这座三百年前的旧教堂，不知有多少次，都会愣在那里，出神好一会儿。

那晚，我刚要走过那里，却看见上了锁的教堂大门上，倚着一位少女，在呜呜咽咽地抽泣。她看上去约莫十六七岁，头巾下面露出金黄色的秀发，衣着也还整洁。听到我的脚步声，她回过头来。我没有一支诗人的妙笔，无法形容她的容貌。她那泪光点点的长睫毛，覆盖着一双清澈如水、含愁似问的碧眼。不知怎的，她只这么一瞥，便穿透我的心底，矜持如我也不可能不为她所动。

她必定遇到什么意外的不幸，才会无所顾忌地站在这里啼哭。

一缕爱怜之情，压倒了我的羞怯心。我不觉走上前去问道：

“你为什么哭啊？我是个外国人，没什么负担，或许能帮你点什么忙。”我简直为自己的大胆惊呆了。

她惊讶地凝望着我的黄种人面孔，大概是我的真情已经形之于色了。

“看来你是个好人，不像他那么坏，也不像我母亲……”

她刚止住的泪水，又顺着那惹人怜爱的面颊流了下来。

“请你救救我吧！免得我沦落到不堪的地步。母亲因为我不肯依她而打我。父亲刚刚过世，明天要下葬了，可是家里连一分钱也没有。”

说完便又哽咽啜泣。我的眼睛只是注视着这少女低头啜泣不住颤动的颈项。

“我送你回家吧。你先冷静下来。这儿人来人往，别人会听见你哭的。”

她刚才说话时，不知不觉将头靠到我的肩上，这时，忽然抬起头来，仿佛才看见我，羞涩地躲开了我。

她大概怕人看见，走得很快。我跟在她后面，走进教堂斜对面的大门。登上一座残破的石梯，到四楼有一扇小门，要弯了腰方能进得去。门上的拉手是用锈铁丝绞成的，少女用力拉了一下，里面有个老太婆嘎声问道：“谁呀？”还没等少女说完“爱丽丝回来了”这句话，门就呼一下打开了。那老太婆头发已经半白，长相不算凶恶，额上刻下了贫苦辛酸的印记，身上穿一件旧绒衣，脚上是

双脏拖鞋。爱丽丝向我点了点头，径自走进屋里。老太婆好像迫不及待似的使劲关上了门。

我茫然站在门外，无意中借着煤油灯光往门上看了一眼。上面用漆写着“艾伦斯特·魏盖尔特”，下面是“裁缝”二字。这大概就是少女亡父的名字了。我听见屋内似有争吵之声，过了一会儿又沉静下来，门又打开了。那个老太婆走了出来，为方才的失礼，向我再三道歉，并把我让进屋里。一进门就是厨房，右面有一扇低矮的窗户，上面挂着洗得雪白的麻布窗帘；左边是一个简陋的砖砌炉灶；正面一间房，门半开着，屋里摆着一张蒙着白布的床。床上躺的想必是那个死者了。老太婆打开炉灶旁边的一扇门，把我让了进去。这是间朝街的阁楼，没有天花板。梁木从屋顶斜着伸向窗子，棚顶糊着纸。在矮得抬不起头的地方放了一张床。屋子中央有张桌子，桌面铺着好看的台布，摆了一两本书和相册，瓷瓶里插着一束名贵的鲜花，和这间屋子不大相称。少女娇羞地站在桌旁。

她长得十分清丽。乳白色的脸庞在灯光映照下，微微泛红。手脚纤细，身材袅娜，绝不像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。老太婆走出屋后，少女这才开口，语调带着土音：

“我把您带到这里来，请您谅解我的苦衷。您一定是个好人，请别见怪。我父亲明天就要安葬，本想去求肖姆贝尔希，您也许不认识他。他是维克多利亚剧院的老板，我在他那里已经工作了两年。本以为能救我们的急，不料他竟乘人之危，对我不怀好意。请您来救救我吧！哪怕我不吃饭，也要从微薄的薪金里省出钱来还

您。要不然，我只好照母亲的意思办了。”说话之间，她已是泪眼模糊，浑身发颤。她抬眼看我时，十分迷人，令人不忍心拒绝她的要求。她这眼波，不知是有意的做作呢，抑或是天然的风韵？

我袋里只有两三个马克，这点钱当然无济于事，便摘下怀表放到桌上，说：“先用这个救一下急吧。让当铺打发伙计到珍宝街三号，找太田取钱就行。”

少女显得又惊讶又感动的样子。我告辞时伸出手去，她竟吻着我的手，手背上溅满她点点的热泪。

噢，这真叫不是冤家不聚头啊！事后，少女亲自到我寓所来表示谢意。我终日枯坐在窗下读书，右有叔本华的著作，左是席勒的作品，现在又插上一枝名贵的鲜花。从那时起，我同少女的交往日渐频繁，连我的同胞也有所察觉，他们臆断我准是找舞女来寻欢作乐的。其实我们二人之间完全是白璧无瑕。

同胞当中有个好事之徒，此处不便说出他的名字，他竟在上司那里谗言诽谤，说我经常出入剧院，结交舞女。上司本来就认为我在学问上已经走入歧途，对我甚为不满，一听此说，便通知公使馆将我免官撤职。公使在传达命令时说，如果立即回国尚可发给路费，倘若羁留不走，将不予任何资助。我要求宽假一个星期，容我考虑。我这时正心烦意乱，又接到生平最令我悲痛的两封来信。两封信几乎是同时寄到的。一封是母亲的绝笔信；另一封是亲戚写来的，报告我挚爱恩慈的母亲过世的情形。母亲信中的内容，不忍复述，更且热泪涔涔，使我无法下笔。

直到此时，我与爱丽丝的交往，比起别人的想象要清白得多。因为家境清寒，她没有受到充分的教育，十五岁时便被招去跟随舞师学艺，从事这个低贱的职业。满师之后，就在维克多利亚剧院演出，现在已是剧院里第二名舞星。然而，正如诗人哈克廉德尔所说，舞蹈演员好比“当代的奴隶”，身世是很凄惨的。为了一点微薄的薪金，白天要练功，晚上要登台。走进化妆室，虽然浓妆艳抹，华饰盛服，一出了剧院，却常是衣食不周，至于那些要赡养父母的，更有说不尽的艰辛。所以，据说她们当中，不少人不得不沦落到兼操贱业的地步。爱丽丝之所以能够幸免，一方面固然由于她为人本分，同时也因为有刚强的父亲多方呵护。她自幼喜欢读书，但所看的书都是从租书铺租来的庸俗小说。我们相识之后，我借书给她看，她渐渐体会到读书的趣味，纠正错误的语音，没有多久，给我的信里，错字也减少了。说起来，我们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师生间的情谊。当她听说我突然给撤职时，不觉大惊失色。但我没有告诉她，这事与她不无关系。她要我瞒着她母亲，怕她母亲知道我没有官费后，会疏远怠慢我。

唉，有些细节就不必在这里说了。就在这时，我对爱丽丝的感情突然炽热起来，终于变得难舍难分。尽管有人不理解我，甚至责备我，不该在一生中的紧要关头做下这种事。然而，我同爱丽丝相见之初，对她的爱情就是很深的。现在，她十分同情我的不幸遭遇，又因惜别在即而不胜悲戚地低垂了头。几缕秀发拂在脸颊上，是那么妩媚动人，深深印在我这深受刺激、不大正常、悲愤欲绝的

脑海里，使我在迷离恍惚之中走到了这一步，又能奈何！

公使约定的日子快到了，我的命运也即将决定。如果就此回国，不但学无所成，还背了一个坏名声，此生不复有出头之日。倘若留下，学费又毫无着落。

当时，能够帮助我的，唯有现在与我同行的相泽谦吉。他在东京，当上了天方大臣的秘书官。在政府官报上，他看到我被撤职的消息，便向某报社总编提议，任用我为该社驻柏林通信记者，负责政治和文艺方面的报道。

报社的报酬虽然微不足道，可是我想，只要搬个家，换个便宜的餐馆，最低生活总可以维持。这时，诚心诚意来帮助我的便是爱丽丝。她极力劝说母亲，让我寄居在她们家里。爱丽丝和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把微乎其微的收入合在一起，在穷困潦倒之中也度过了些愉快的时日。

每天早晨喝过咖啡，爱丽丝便去排练场，如果不排练就留在家里，我则到国王街一家门面很窄、进深却很长的休息所，浏览所有的报纸，用铅笔抄下各种资料。在这间借天窗采光的屋子里，有些是没有固定职业的年轻人，也有靠出借小额贷款优游度日的老人，还有一些是从交易所出来偷闲片刻的生意人。我和他们坐在一起，在冰凉的石桌上挥笔疾书，连年轻侍女送来的咖啡放冷了都顾不上喝。墙上并排挂了许多种报纸，全用木头报夹夹了起来。我一再过去换报纸，人家不知要怎样猜度呢！一点钟左右，爱丽丝从剧院排练回来，顺路到这里来找我一同回去。对这个体态轻盈、能作掌上

舞的少女，必定会有人看了之后感到惊讶。

我的学业是荒废了。靠屋顶下一盏昏暗的灯光，爱丽丝从剧院回来后坐在椅子上做针线活，我在她旁边的桌子上写新闻稿。这和从前拼凑枯燥乏味的法律条文截然不同，现在是综合报道风云变幻的政界动向，以及有关文学美术界的新思潮等。我与其说是学皮约尔涅^①，毋宁说是尽可能用海涅的构思方法，写出各种文章来。其中，德皇威廉一世和腓力特烈三世相继崩殂，新皇继位，俾斯麦侯爵的进退如何等问题，报道尤为详尽。所以，这一向忙碌不堪，根本无暇翻阅自己有限的藏书，更不要说温习功课了。大学学籍虽然还保留着，但因缴不出学费，所以尽管只选修一门功课，也难得去听上一回。

学业固然荒废了，却长了另外一种见识。何以见得呢？说来当时欧洲各国在民间学术的普及上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赶得上德国。许多有见地的论文，散见于几百种报纸杂志上。自从当了通讯记者之后，以我在大学里培养出来的敏锐的眼光，通过这一向的大量阅读、抄写摘录，知识面不断拓宽，如今能够触类旁通，综合概括，达到了本国留学生所梦想不到的境界。他们当中甚至有人连德国报上的社论都不常看。

明治二十一年的冬天来到了。大街上的人行道，积雪已用铁锹铲除，铺上沙子。修道院街这一带路面上结了一层薄冰，高高低低

① 皮约尔涅（Ludwig Börne，1786—1837）：德国作家，青年德意志派成员。受德国政府压迫，避居法国。曾同海涅进行过论争。

已经看不出。清早一开门，冻死的麻雀散落地上，看着叫人觉得可怜。屋内尽管生火取暖，可是北欧的寒气依然透过石墙，渗过棉衣浸入体肤，实在令人难以忍受。前二三天的夜里，爱丽丝晕倒在舞台上，由别人扶回家来。从那以后，她说不舒服，在家休息，吃了东西便想吐。还是爱丽丝的母亲首先想到，她是不是怀孕了？唉，正当我前途渺茫、一身无着之际，果真这样，叫我怎么办呢？

这天是星期日，我待在家里，心情抑郁寡欢。爱丽丝还不至于要卧床，她坐在小火炉边一把椅子上，一声也不响。这时，外面有人叩门，不大一会儿，爱丽丝的母亲从厨房里进来，交给我一封信。信上的字体很熟悉，一看就知道是相泽的笔迹。贴的是德国邮票，盖着柏林的邮戳。我有些纳闷，拆开一看，里面写道：“事出仓促，未及函告。我随天方大臣已于昨夜抵达柏林。大臣拟召见你，望速来。实恢复名誉之良机。匆匆，不赘。”爱丽丝见我看完信，神情茫然，便问：“是家乡来的信吗？不会是什么坏消息吧？”她大概以为又是报社关于稿酬的事。“不是，别担心。你知道，那个相泽陪着大臣到了柏林，叫我去一趟。事情很急，要我马上去。”

即便是母亲打发心爱的独子出门，恐怕也不及爱丽丝如此妥帖周到。考虑到我要谒见大臣，她便扶病起来，给我找了一件雪白的衬衫，拿出一向保存得好好的二排对扣的大礼服，连领带也是她亲手给我系的。

“这样一来谁能说你不体面！你照照我的镜子看！怎么一脸不

高兴的样子？连我都想跟着你去见识见识呢。”接着她庄重说道：“不像了，换上这身衣服，简直认不出我的丰太郎了。”她沉吟了一下又说：“倘若你有飞黄腾达的一天，即使我的病不是母亲说的那种，你也不会遗弃我吧？”

“什么？飞黄腾达？”我苦笑了一下，“几年来我已经绝了涉足官场的念头。我并非想去见大臣，只是想看看阔别几年的朋友罢了。”爱丽丝的母亲叫来一辆最好的马车，车轮轧碾过积雪的大街，停在窗下。我戴好手套，披上不十分干净的大衣，拿起帽子，同爱丽丝吻别之后，便走下楼去。她打开结了冰的窗户，任凭北风拂弄她蓬乱的头发，目送我乘上马车离去。

我在皇家饭店门口下了车。向侍者问清相泽秘书官的房间号码，踏上很久没有走过的大理石楼梯。我先走进衣帽间，中间的柱子旁边摆着铺了长毛绒的沙发，正面竖着穿衣镜，我脱下大衣，然后沿着走廊走到相泽的房门口。我不禁有些犹豫：在大学读书时，相泽曾极口称赞我品行端正，今天相见，不知他会用怎样的目光来看我？走进房间一见面，相泽外表虽然比从前略胖，更显魁伟，但性情依然豪爽。对我的有失检点似乎并不怎么介意。彼此来不及畅叙别情，他便引我去谒见大臣。要我办的事，其实就是翻译一份德文紧急文件。我接过文件，退出大臣房间，相泽也随后出来，邀我一起去吃午饭。

在饭桌上，多半是他问我答。因为他生平一帆风顺，而我却是命运多蹇。

我开诚布公，诉说我所遭遇的不幸，相泽听了不时感到惊讶，不仅没有责备我的意思，反而斥责那班庸俗小人。等我讲完，他正色规劝了我一番。大致意思是：这些事之所以发生，是因为你天性懦弱之故，事到如今，说也无济于事。然而，一个才学兼备的人，岂能为一个少女的爱情，毫无目的地长此以往！目前天方伯爵有意要借重你的德语。他知道你当时被革职的原因，已有先入之见，我也不便劝他改变看法。伯爵要是看出我在维护你，不仅于你无益，对我自己也不利。推荐一个人，最好是先露其才。你当以自己的才干取信于大臣。再者，你同那少女的关系，即使她对你真心实意，彼此情深意浓，这样的爱情也绝非出于慕才，实则上是男女之间的情好而已。你应当痛下决心，同她断绝这层关系。

仿佛是大海上迷失方向的人，望见了远山，相泽给我指明了前景。然而，这远山尚在浓雾之中，究竟何时方能到达？再者，即使到达了，我是否就能心满意足，也难预料。眼前生活虽然清苦，却也不无乐趣，爱丽丝的爱情也使我割舍不得。我这颗软弱的心，一时竟拿不定主意，姑且听从朋友的劝告，答应他斩断这段情缘。同我敌对的一切，我为了不失身份，还常常能抵挡一番，然而，对于朋友，我却说不出一个“不”字来。

我告辞出来，寒风扑面。旅馆的餐厅里，关着双层玻璃窗，又生着陶制火炉，一走出来，下午四时的寒气，透过单薄的大衣，裹在身上，实在难以禁受，不但身上起了鸡皮疙瘩，连心里也感到一层寒意。

一夜之间，我便把文件译完。此后，到皇家饭店去的次数多起来。起初，大臣只同我谈公事，后来便提到国内发生的一些事情，听听我的见解，偶尔也讲些旅途上人家闹的笑话，说罢哈哈大笑。

大约过了一个月，有一天，大臣突然问我：“我明天要去俄国，你能随我去一趟吗？”因为相泽公务繁忙，已经几天没有见到他。这一问，我不免感到意外，随即答道：“敢不从命？”说来惭愧，我这回答，并非出于当机立断。凡是我所信任的人猝然间问我什么事时，我往往不假思索就应承下来，而不去推究该如何回答才算得体。一经允诺，即便发现有为难之处，也只好勉为其难，硬着头皮去履行自己的诺言。

当天我领了旅费和译稿费回家。把译稿费交给爱丽丝，这笔钱足够她们维持到我从俄国回来。爱丽丝告诉我，经过医生检查，她确是怀了孕。因为有贫血，需要休养几个月。可是剧院老板说，她请假太久，已经被开除，其实，她才请了一个月假。对她这样苛刻，自有别的原因。我去旅行的事，爱丽丝并无烦恼的表示，因为她对我的情意是深信不疑的。

这次乘火车出门，路途不算远，所以无须太多准备。只借了一套合身的黑礼服，新买一本哥达版的俄国宫廷贵族名录和两三本字典，届时收进一只小皮箱里就行了。近来接二连三的事很多，我走之后，爱丽丝留在家里会更加烦闷，尤其怕她到车站送行时会哭哭啼啼，所以第二天清早便打发她母亲陪她上朋友家去。我收拾好行装，锁上门，把钥匙存在鞋铺老板那里便动身走了。